

总摇摇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辑录四百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1644年到1911年共延续了267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9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

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录,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新奇。基于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录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中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的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

何国家的文化都必须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 ,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 ,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 ,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 ,因为它们既是“ 中国的 ” ,也是“ 世界的 ”。愿“ 编译丛刊 ”在新世纪中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 ,作为一座文化的桥梁、友谊的桥梁 ,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摇沛

圆园园年 缘月

出版说明

清代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历史文献在清代的外文文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不仅研究西方汉学若不从此入手,就无法掌握和真正了解西方汉学的来龙去脉及其知识演化和变迁的内在原因;同时,研究中国明清基督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若不掌握入华传教士的相关文献,也无法进入其历史的内核。多年来,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上,直接研究外文原始文献和档案的较少,翻译出版的史料也很有限,这或许是该领域的研究总是进展缓慢、鲜有创造的一个原因。

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大象出版社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合作,自1999年起组织出版了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丛书,从基本文献的翻译入手,分三个系列向国内读者介绍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本书系已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五”期间重点图书出版项目,目前已陆续出版十余种。在继续致力于这一书系组织出版的同时,为配合国家的清史文献的整理出版,我们将部分有关清代传教士著作和文献的译著,从这套书系转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编译丛刊”中出版,特此对读者诸君作一说明。

学术乃天下公器。清史纂修,世纪大事,我辈能参与其中,为之尽心,足矣!

大象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二〇〇四年 远月

中文版序： 传教士汉学的重要著作 ——读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

摇摇如果把西方汉学的演变历程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时期，那么，传教士汉学应是其学术和思想发展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它不仅与前期的游记汉学相承接，而且它也是西方专业汉学的奠基石，为西方专业汉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材料和文献，其研究的方法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专业汉学。欧洲著名汉学家许理和认为，对早期在华耶稣会的研究（16和17世纪）是研究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费正清在谈到基督新教的研究时曾说，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是美国汉学研究中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一个方面。

从19世纪年代后期，中国学术界重新开始了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令人欣慰的成果，何高济等人所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冯承钧和耿昇所译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何高济和李申和译的曾德昭的《大中国志》都是十分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年代以来，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大象出版社合作组织出版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来信》、《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等系列丛书循着谢方先生主编的《中外关系史译丛》的学术路向并进一步集中在早期传教士汉学上，从而使传教士汉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向纵深发展。

在研究方面，孟华的《伏尔泰与孔子》、许明龙的《欧洲十八世纪

中国热》、《黄嘉略与法国汉学》、计翔翔的《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戚印平的《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等著作都是基于传教士基本文献而展开的,从而取得了实质性的学术进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国平和吴志良在澳门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其成就绝不低于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水平。但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国内不少的论文和著作在原创性上不够,一些著作充其量是对国外学术著作的转述和介绍,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早期传教士原始文献的掌握不够,在研究方法上宏大叙事过多,个案和专题研究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下,若要推动对西方传教士汉学的研究,最重要的仍是对其基本文献和著作的翻译,以及对专人和专著的个案研究。

郭强等译者奉献给读者的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一书,就是这一思路的一个结果。

从早期传教士汉学的历史来看,法国耶稣会士的入华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这不仅预示着葡萄牙保教权的丧失,在华耶稣会内部国别矛盾的开始,而且自法国传教士入华后,传教士汉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李明的书就是这一趋势开始的一个标志。在法国传教士入华前,入华传教士已经在西方出版了一些重要的汉学著作,像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安文思的《中国新史》,金尼格改写的《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柏应理等人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等,现在我们还不能从总体来评价这些著作,因为从国内学术界来说,对这些著作尚没有逐一的深入研究。但从笔者本人所能读到的曾德昭、安文思、金尼格改写的利玛窦的著作,以及当时欧洲的一些英文翻译本著作来看,李明的书与之相比有很多独到之处。

首先,这本书对清康熙年间的许多重要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上述著作大都是晚明或清初期的著作,对康熙时期情况的介绍有限,而李明这本书介绍得较为深入。书中多处介绍和描述了传教士和康熙的谈话,如在第二封信中说“在我看来,皇帝是中等以上的身材,比欧洲自炫身材匀称的普通人稍胖,但比一般中国人希望的稍

瘦一点，面庞丰满，留有患过天花的疤痕。前额宽大，鼻子和眼睛是中国人式的细小的。嘴很美，面孔的下半部长得很好。他的气色也很好。人们可以发现他的举止行为中有某种东西使他具有主宰者的气派，使他与众不同”。这使欧洲的读者对中国的皇帝有了一种具体的形象。在第十三封信中，对康熙在 1713 年批准的礼部关于善待入华传教士，并允许天主教自由传教的议奏一事做了很详细的介绍，这使我们可以根据中文文献对这一重要的事件做更为深入的研究。^①也正是通过李明等入华法国传教士的介绍，康熙的“1713 年宽容敕令”在当时的西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书中有许多细节也很有意思，例如，康熙为了解传教士的真实想法，曾在传教士身边安插了人，每天把其言行向他汇报；又如在康熙平三番之乱时，令南怀仁铸火炮，但如何将火炮运到前方是个大问题，最后南怀仁采取了先在北京铸成火炮的部件，然后运到前方组装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些细节书中还有不少，而这些具体生动的历史细节正是中文文献中所缺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书可以补清史中文文献之不足。

其次，对康熙年间的中国天主教情况的介绍也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从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到利玛窦的《天主教传入中国史》，早期汉学都始终把中国天主教史作为基本的内容，因为此时的汉学基本上是在传教学的框架中发展的。但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传教士汉学却提供给了我们研究明清天主教史的基本文献和许多重要的细节，这些事实和细节在中文文献中也很难找到。例如，李明在第十二封信中介绍了他本人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当时传教士在中国的分配情况，以及当时中国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他说：“在中国我们拥有非常精心编制的教理书，书中清楚明白地解释了基督教的全部教义、生命、奇迹、我主的死以及上帝和教会的戒律。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对四福音书特别的阐述、有关伦理道德和基督教道德的论著，以及有理有据和众人皆可参与的论战，还有一生中不同阶段下所要进行的精

① 参阅吴伯姬《康熙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年版。

神上的宗教修行仪式、圣事惯用的祈祷和训言以及针对学者们的神学。因为我们部分地翻译了圣托马斯的《概论》；最后是为教权所译的圣伊纳爵的《修炼》。编制这本书的目的在于使福音传教的神圣种子四处传播，大量地开花结果。我们曾经期望拥有弥撒经本的译文，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准许用中文唱弥撒，我们还期望得到圣经的全译本。”这使我们了解到当时传教士们传教的基本情况。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始终是中国宗教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特别是早期传教士传教的方法、使用的经文及信徒的信仰等以往的研究不够，只要对比一下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一个没有传教内容和教徒信仰内容的宗教史总是一种不全面的宗教史，即便是从学术的角度而不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宗教史的研究也是这样。当然，在传教士的这些书中有很强的护教和宣教的成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他们的介绍中获得一些教会史的基本情况。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李明的书是有其学术价值的。

其实，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真正的影响并不在以上两点，这两点只是从今天中国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的。作为一本汉学著作，它对当时欧洲的影响是极大的，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它的影响要超过它以前的所有传教士汉学著作，其原因是这本书卷入了著名的礼仪之争，如果研究礼仪之争，这本书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罗光主教在他著名的《教廷与中国使节史》中说，当时李明的著作出版后受到了反对中国礼仪的欧洲神学家们的批评，先后“开会三十次，于1954年十月十八日判决……有悖于神学原则”^①。所谓“有悖神学原则”之处就在于李明书中对中国祭孔、祭祖风俗的肯定及对孔子思想的赞扬。李明在第七封信中详细介绍了孔子的生平和事迹，并翻译了部分的孔子的语录。他说：“孔子是中国文学的主要光辉所在，如果不就他做专门的介绍，那么，我对您所做的介绍就不可能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因为这正是他们理论最清纯的源泉，他们的哲学，

^①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8页，台湾光启出版社，1955年。

他们的立法者，他们的权威人物。尽管孔子从未当过皇帝，却可以说他一生中曾经统治了中国大部分疆土，而死后，以他生前宣扬的箴言，以及他所作出的光辉榜样，他在治理国家中所占的位置谁也无法胜过他，他依然是君子中的典范。”而且，李明从耶稣会的立场出发，认为孔子并不是神，他说：“全国上下敬他为圣人，并鼓励后人对他的崇敬之情，这种感情显然将与世长存。国君们在他死后在各地为他建立庙宇，学者们定时前去致以政治的敬意。在许多地方可见大字书写的荣誉称号：致大师，致第一学者，致圣人，致皇帝和国君之师。然而，非常不同寻常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把他造成一座神。”

李明甚至认为，从中国的编年史来看，作为诺亚后代的中国人对上帝的信仰比欧洲还要早，比欧洲还要纯洁。在第十封信谈到中国的宗教信仰时，他说：“草创之初，中国也并不比世界其他民族高明多少，他们几乎是从人类的起源中寻觅到了神灵和宗教的最初事迹。诺亚的儿女散布到了东亚大地，很可能建立了这个王国；大洪水时期，他们领教了造物主的威力，从而也认识了造物主，连其子子孙孙都对他有莫名的畏惧。时至今日，从中国人的历史中还可以找到那些雪泥鸿爪，所以这一点几乎是不容置疑的。”这显然是一种索隐派的观点，其实我们只要认真研究利玛窦的著作，就可以发现，那里已经有了以后白晋等人的索隐派的基本观点，只不过白晋等人走得更远些罢了。

如果仅到此，巴黎索邦神学院的神学家们倒说不出什么，但李明却以此来批评欧洲。他说：“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此后三百年的周幽王时期——即耶稣诞生前八百年左右，偶像崇拜还没有影响到人们的精神境界。所以，中国人连续两千年都保持了对上帝的膜拜和景仰，简直可以作为基督徒的表率。”“有时候，我们又觉得很奇怪，自耶稣诞生以来，中国和印度始终都淹没在偶像崇拜的迷雾之中，而希腊、部分非洲国家和整个欧洲却笼罩在基督信仰的光环之下。然而我们却没有发现，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真正的上帝信仰，谨守着最纯洁的道德准则，相对而言，欧洲和其他

地方却谬误百出,思想堕落。”

正是这些话惹恼了正统的神学家。平心而论,李明在这本书中并没有只赞颂中国,他在许多方面同样对中国做了批评,有许多批评在今天看来也是合理的。而他的这本书所以被教会所禁与当时欧洲的思想文化背景有关。当时以伏尔泰为首的启蒙思想家们正在对教会展开猛烈的批评,正当此时,入华耶稣会士的来信和著作向法国人展开了一幅中国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的画卷:这个东方古国在很长时间没有基督的信仰,但历史却那样丰富和悠久;中国人所信的孔子并不是神,他们在很长的历史中也不信上帝,但却有着比欧洲人还要纯净的道德。这说明什么呢?这有力地证明上帝的信仰并不具有普世性,这说明以往的那种以基督教历史作为全部历史编年史的荒唐与可笑。^①对李明这本书感兴趣的不仅有伏尔泰,还有莱布尼茨、孟德斯鸠和赫尔德等人。李明自己恐怕也没有想到,他本是为耶稣会的传教路线辩护,用来回答方济各、道明会等修会对耶稣会的批评的观点,却成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用来反对教会的武器。

因此,要真正读懂李明这本书仅仅从中国方面来理解是远远不够的,仅仅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理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从当时的欧洲思想史来理解此书,还要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本书的内容和结论,而这也正是传教士汉学最具魅力之处,它不仅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文献所缺失的丰富画卷,还给了我们一把打开 17 至 18 世纪欧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特别的钥匙。

张西平

1994 年五一节写于北京枣林路游心书屋

^① 孟华:《福尔泰与孔子》,新华出版社,1993 年。

译者说明

摇摇员23年于巴黎出版的《中国近事报道》是法国传教士李明来华期间写给国内要人的通信汇编。该书共收录十四封书信。首版为两卷本,出版获得巨大成功,短短四年间法文重版五次,并有英文、意大利文及德文译本。然而,员44年巴黎索尔邦神学院的一纸禁令竟将其尘封了近三个世纪,直至员89年再版。

全书按书信分章节,共十四封信。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做了详尽的报道。在信件排列上,作者并未对收信人的地位高低给以太多的重视,而是根据信中谈论的材料的顺序来安排。第一封信介绍暹罗(今泰国)——北京之行,是对如何来到中华帝国做个交待;第二封信谈的是皇帝召见及京师情况;第三、四封信介绍中国城市、房屋建筑、气候、土地、运河、水道及物产;然后,进而言及中国人的国民特性、习惯、优缺点、语言、文字、道德及中国人的才智;后面几封信谈的则是更深层的问题,如政府和政治、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在中国的立足和发展。

直到员8世纪中叶,法国耶稣会士还是远东见闻几乎独一无二的介绍者。但是,他们的作品都是集体创作,并且都是由一个出版者兼新闻检查官杜赫德神父编辑成册的,而他本人却从未到过中国。而《中国近事报道》却是李明神父个人对中国的全面报道。他的风趣、他特有的毫不妥协,文笔的幽默和自然流畅都未经过任何文学上的

包装。该书的真实性是它获得成功的首要条件,而借助这本书,欧洲人发现自己并不是世界上仅有的文明人,从而使欧洲人信念的支柱发生了动摇,直接有损于欧洲中心论,这是该书的真正意义所在。

一、《中国近事报道》虽然被禁,却没有被人们遗忘,三个世纪中,它不断被人们引用,它不仅在当时对西方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了解早期西方汉学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都会有很大帮助,这是我们克服巨大的困难将此书译成中文的动力和初衷。

二、本书根据 1854 年法国菲布斯出版社的新版本翻译。由于《中国近事报道》写于三个多世纪前,世事变迁巨大,三百年前的人物、事件已不为今人所熟知,连有些地理名称也已不复存在或已变更,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吐布尔·布热尔在本书再版时加了许多注释以方便读者。对作者李明的原注解再版时则加上“作者自注”四字以示区别。

考虑到中国读者阅读时的方便,译者又加了一些注解,诸如地理名称、古今度量衡的换算等,为保存作者三个世纪前写作时的习惯用法,译者仅在某量词第一次出现时加注说明。译者所加的注解,在注文未注有“译者注”字样。

三、由于本书 1854 年法文版再版时“保留中国名字和中国字在初始版本中出现的注音”,以及“某些技术词依然采用旧有的拼法”,译者虽尽极大努力,但对个别词仍未能找到对应的中文或译文,只得存疑,敬请读者原谅。

四、译文由三人合作:郭强——法文版序、作者的话、第一至第八封信;龙云——第九至第十一封信;李伟——第十二至第十四封信。全书由郭强校订。

五、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中华书局的陈铮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莫爱萍教授的热心支持,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摇者

1854 年初夏,于北京

目 录

中文版序 :传教士汉学的重要著作	
——读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	(四四)
译者说明	(四四)
1854年法文版序 :上帝创造了中国.....	(四四)
作者的话	(四四)
第一封信摇致蓬查特兰大臣暨国务秘书阁下	(四四)
暹罗—北京之旅	
第二封信摇致德内穆尔公爵夫人	(四四)
皇帝接见及北京城见闻	
第三封信摇致富尔斯登堡主教大人	(四四)
城市、建筑物以及中国最巨大浩繁的工程	
第四封信摇致克莱西伯爵	(四四)
关于中国的气候、土地、运河、河流和水果	
第五封信摇致外交国务秘书德·托尔西侯爵先生	(四四)
中华民族的特点 其悠久、杰出之处及优缺点	
第六封信摇致德布永公爵夫人	(四四)

有关中国人生活的清洁卫生和雅致奢华

第七封信摇致法国第一重臣、大主教兰斯公爵大人阁下

..... (猿源)

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书籍和道德

第八封信摇致国务秘书德菲利波阁下 (猿圆)

关于中国人思想的特点

第九封信摇致红衣主教德斯泰大人 (猿苑)

论中国政治及政府

第十封信摇致红衣主教布荣 (猿缘)

论中国古今宗教

第十一封信摇致国务参事德胡耶先生 (猿四)

论基督教在中国的扎根和发展

第十二封信摇致国王的忏悔神父、尊敬的拉雪兹神父

..... (猿五)

传教士在中国宣讲耶稣教义的方式和新基督徒们的虔诚

第十三封信摇致让松红衣主教大人 (猿六)

基督教新近在中华帝国全境得到皇帝诏书首肯

第十四封信摇致比尼翁院长大人 (猿四)

我们在印度和中国所做观察的概述

1625年法文版序： 上帝创造了中国……

“亵渎神灵的”、“亵渎宗教的”、“异端的”，这些形容词就是那些基督教正统的维护者们对可尊敬的李明神父^①的《中国近事报道》一书在 1625 年发表时所作出的反响。在一个为“东方的事物”感到恼火的社会中，关于中国的记叙搅乱了某些人的思绪，却使另一些人展开了思想的翅膀。四个世纪前，一位著名的威尼斯人曾经把中国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细缝，欧洲人对他所描述的远东产生了美妙的幻象，但却是一瞬即逝。16 世纪，早期来华传教士从当地发回的记事曾给人以最大的新的魅力，新的企盼。善良的人们期待着一本能把去过该地区旅行的人的知识归纳综合的书，一本能对真实与幻象给予判断的书。总之，一本能公正地使善良的人们明确真相的书。李明的这本书正是完成了这一使命。它把天才和严谨的态度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却使那个时代笃信宗教的人大为光火。但是，他们的愤怒本身将为那个从此不断引起人们注目的国家提供谈资：由于对一本书的诽谤中伤——还有更甚于对书本身的攻击，该书在第一版面世

① 本著作最初的版本把李明神父的名字写成“~~李~~明神父”。传统却更喜欢写成一个字，即“~~李~~明神父”。^②

② 摇本书的注释凡未加说明的均为法文版注释。——中译注

四年后,被索尔邦宣布为禁书——中国将对整整一个世纪(那个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世纪)产生影响,并成为人们真正崇拜的对象——在我们某些当代人仍为此献身的时刻,李明神父以其对中国的特点罕见中肯的论述,始终在我们的想象里熠熠闪光。

1713年猿月猿日,在布列斯特港,“瓦索”号轮船和马里涅船队正在整装待发,开往暹罗。船上载有六名耶稣会修士:塔查尔、刘应、洪若翰、白晋、张诚以及波尔多人,是年三十岁的路易·达尼埃尔·勒贡特(李明)。这些神父皆由国家科学院以国王数学家的身份被派往中国皇帝康熙朝候职。此前,法国并未介入远东事务。中国是荷兰和英吉利瓜分没落的葡萄牙王国战利品的角逐之所。1710年,巴达维的一位使者曾和中华帝国建立过外交上的关系。但是,与日本一样,中国声称对一切西方的进入均采取强硬的态度。而上一世纪末在中国土地上落脚的传教士,都是经过千辛万苦,并经受过法律上的迫害,才得以站住脚跟的。当时,在18世纪的1710年代,惟有葡萄牙具有帝国开启的一扇窄窄的门,这就是澳门。葡萄牙利用这个岛对到达这一海域的所有传教团行使保护权,并有条件地严格控制整个欧洲传教士和商人的派遣。

长期居住在澳门的耶稣会士是最早以宗教信仰的名义,奋起反对这种限制性做法的。他们使人向路易十四报告他们的困苦处境:他们曾和中国人及中国朝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是,他们需要援助,并请求再派些神父来。重要的是,新来的人必须是有学问的人。因为,要争取有权有势的官员和宫廷中博学之士的灵魂,需要既是圣徒又是学者的人。这一条件,几乎只有圣伊格纳斯的耶稣会修士才能达到。由于葡萄牙的保护权禁止法国去满足这一要求,科尔贝设想采取迂回的道路给以援助。巴黎不久前接待了暹罗的使者,看来暹罗有可能成为法国进入印度支那的通道。后来,法国向帕拉—纳莱国王派出一个由荣誉勋位获得者德·肖蒙和德·索瓦西修道院长率领的十分正式的使团,使团成员中有六位传教士数学家,他们的任务就是随后设法进入中国。

由于被剥夺了在亚洲的至高无上权力的最后特权，葡萄牙被激怒了。对于为路易十四暂时利益服务的耶稣会士的到来，葡萄牙采取的对策是：澳门没收了法国拨给传教士的费用。李明和他的同伴们立即处于贫困之中。他不得不于1685年返回法国，受命向上级汇报这场冲突以及使团的处境。在华不足五年的时间里，他出色地完成了既是传教士又是人类学学者的工作。

但是，他这次在中国的遭遇并不止于此：法国公众，甚至欧洲公众，日益增长的好奇心促使他发表他的《在中国》旅行记，并使作品的出版获得重大的成功（法文重版五次，最后一版发表在1689年，并有英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的译本，这在当时可称得上是无与伦比的成功）。的确，作品有其吸引旅行爱好者之处：有大量关于中华帝国的知识介绍，他那有趣的对离奇轶闻趣事的描述，向惊奇的读者揭示了一个出奇文明的社会的风俗、艺术和建筑，以及它的政治、哲学和科学。什么？远离欧洲的光辉，远离真正信仰的真理，竟然有人懂得道德、科学和神圣的和谐！特别是——作者还强调说——这些人，尽管身处遥远的东方，却自然地接近了最神圣的基督教的奥秘，甚至还准备把它变成自己的信仰，只要人们尊重他们自古以来建立的传统。这些传统仔细看来与教会的基本信条丝毫不相矛盾。作者的意图明显地在捍卫在北京执行的、并取得惊人成功的政策，这就是调和中国思想和基督教教义的政策。可惜的是，1685年，科尔贝早已作古，曼特侬夫人独占着国王的心灵。严守教律的教派紧随她，坚定地反对任何创新，比任何时候都更成功地遏制自由思想的影响。教会人士，首先是耶稣会士，成为各种阴谋诡计的目标，哪怕他们想要发表一个意见，都有可能触动受宠于凡尔赛的高级教士们的多疑的正统主义，他们当中就有那难对付的博西埃。人们可以设想，李明神父如此既具有说服力又大胆的观点将怎样激怒这群保守的先生们：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就在法国的舞台上演了。

以什么方式在中国传教的争论并非新鲜事。自从1685年，使团创建人，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就违背了罗马教会的指示，他开创了一